

奥古斯汀·亨利：中国植物学的先驱，1882-1990

阿松波塔·布鲁姆菲尔德

袁法森 译

“这位爱尔兰学者对中国植物知识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欧内斯特“华人”·威尔荪

谁是这位爱尔兰学者？他对我们了解中国植物有何贡献？

奥古斯汀·亨利被认作为爱尔兰人，是源于他的父亲伯纳德·亨利。1848年，18岁的伯纳德·亨利离开泰纳（现隶属于北爱尔兰德里郡波特格伦北部的一个教区），登上了一艘从纽里启航的饥荒船。伯纳德在1849年抵达纽约后加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然后又跟随淘金热前往澳大利亚。直到1854年他才回到了爱尔兰老家，但却没有带回任何巨额财富。

伯纳德在苏格兰的邓迪市看望他妹妹玛丽时，遇到了改信天主教的新教徒玛丽·麦克纳米，并与她结了婚。他们在那里经营了一家小杂货店。1856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第二年即1857年7月2日，奥古斯汀也出生了。一个月后，他们全家搬回了爱尔兰，定居在蒂龙郡的库克斯敦，伯纳德在那里开展了非常成功的亚麻贸易业务。1871年，家庭成员增加了，他们又生了四个男孩和三个女孩。不幸的是，玛丽在儿子丹尼尔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九个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孩子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他们的祖母在他们的祖籍地泰纳一起度过的。

奥古斯汀在就读库克斯城学院期间，学业表现十分出色。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自学成才并且已经在学院学习了两年的同学。这位同学立志要进入戈尔韦女王学院，后来他获得了奖学金，“戴着红围巾，无比骄傲地成为了第一个就读于女王学院的工人”。受此鼓舞，奥古斯汀开始自学拉丁语，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戈尔韦女王学院。亨利在那里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他在 1877 年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而且在学士学位考试中获得了金质奖章。第二年，他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取得了医学硕士学位，然后到伦敦一家医院工作了一年。

回到贝尔法斯特后，亨利的老教授告诉他，罗伯特·赫德爵士希望找一个懂点医学知识的年轻人到中国担任海关官员，年薪为 420 英镑。考虑到这一任命，亨利前往爱丁堡参加了特殊医学考试（双倍费用），并在 1881 年 8 月 10 日被正式授予了医学执业资格。然后他还参加和通过了规定的考试，最终正式被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录取了。

即便仅仅作为一名在中国为其终生事业开辟了道路的爱尔兰同胞，亨利也早就听说过大名鼎鼎的罗伯特·赫德了。1835 年，赫德出生在阿马郡的波塔当，和亨利一样，他也被认作为爱尔兰人。作为十二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也是这个大家庭的长子。1850 年，赫德分别在一所英格兰的卫斯理学校和另一所都柏林的卫斯理联系学校学习了一年后，十五岁的他进入了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并在三年以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在晚年，赫德总是试图从爱尔兰各地的女王学院招募像亨利那样的爱尔兰同胞——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像亨利一样拥有医学学位。

罗伯特·赫德自己受雇于清政府的历程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毕业后的第二年，女王学院提名他担任英国驻中国领事团队的一个翻译职位。他先后被派驻到香港、

宁波和广州，并在那期间开始学习汉语。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发现他们的本土海关既低效又腐败，于是决定通过雇用外国人来重组他们的海关。因此赫德在抵达中国五年后，辞去了英国领事团队的职务，在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中担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一职。1863年，鉴于清政府对其工作的赞赏，赫德年仅二十八岁就被任命为了海关总税务司。

赫德的职业生涯建立在他的廉洁名声以及创新才能之上。他的主要职责包括：为中国政府收取关税；将海关制度推广到更多的海港、河港以及一些内陆关口；将海关的运作制度化并提高海关的效率和诚信度。他也提出建立现代邮政系统，并建议将监督国内税收入纳入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的职责。对于像亨利这样对各种各样的工作以及对不同地区的经历感兴趣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赫德还为他的同僚们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作为一名不同寻常的官员，他与中西方官员关系密切，也鼓励中西双方相互理解。因此，1862年他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综合性学校），使中国人能够学习语言、文化和科学以满足未来的外交需要。赫德作为在中国最值得被信赖的外国人，尽管他在1908年就离开了中国，但是直到1911年他仍然挂着总税务司的头衔。

这就是奥古斯汀·亨利成功加入的海关机构。1881年，亨利和另一名新成员洛里刚刚抵达香港时，就拜访了同样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的香港首席大法官罗素，这种爱尔兰的人脉关系继续延伸着。罗素大法官又把他们介绍给同样是爱尔兰人的香港汇丰银行总经理托马斯·杰克逊。杰克逊说，“你猜你们不是很有钱吧？”然后告诉银行柜员“这两位先生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最后他们每人借了50英镑。亨利没有忘记这件事，他从爱尔兰海外关系网的效力中得到了一个

重要的启示。后来亨利通过这家银行开展了他所有的事业，并在多年以后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爱丽丝。亨利和洛里随后前往上海，那里的总领事帕特里克·休斯也是一位来自唐郡纽里的爱尔兰人。

1881年7月亨利到任后，他发现天气非常炎热。他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然而，亨利在早上五六点就起床了，（用他的日记中的话说）“骑着小马外出，然后回来洗澡和吃早餐”。那年冬天，亨利是在上海度过的。他成为上海英侨俱乐部的一员，去骑马、参加赛马（赛马是从蒙古进口的）和打网球。

1882年3月10日他被派往宜昌任职，并于1882年4月16日抵达那里。宜昌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位于长江上游，靠近湖北省著名的长江三峡的繁忙港口。1877年，宜昌就已经成为通商口岸和重要的商埠。那时，所有来往中国的贸易都要经过海关官员的检查。宜昌的出口商品包括马蹄大黄（掌叶大黄）、麋鹿角、生丝黄绢、白蜡、兽皮、麝香、鸦片等中草药，而进口商品包括曼切斯特的棉花和棉绒等货物。渔业在宜昌非常重要，据亨利记载，在长江对岸中国人驯化了水獭来捕鱼。宜昌有三万人口，“外国人聚集区”就坐落在江边。这个聚集区设有英国和德国领事馆，以及一座由乔治·科克伯恩牧师管理的苏格兰教堂，牧师的妻子是第一位居住在宜昌的欧洲女性。此外，那里还设有一个罗马天主教方济会和一个修道院。

亨利一直忙于他的海关和医疗工作，下班后他会打网球、打牌和散步。在他的日记中可以找到这段时期的记录：

1882年5月25日：与同事一起外出散步寻找化石，并向当地老师邓先生学习中文。给爱尔兰阿斯隆博瑙之家的伊芙琳·格里森小姐写信。

1882年10月14日：与英国代理领事E. L. 艾伦一起经修道院山谷前往桃花岭。乘船前往三游洞和六英里外的羊圈洞。

1883年11月11日：前往莲沱参观，第二天从莲沱前往金刚山道观。

1884年8月22日：订购罗伯特·本特利的《植物学》

1884年11月25日：过江采集石榴棱（音译，原文Shil-Liu_Lung）。

亨利通过医学研究转而进入植物学的研究，开始对植物的天然治疗用途产生了兴趣。到了第二年3月，亨利给当时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园长约瑟夫·道尔顿·胡克爵士写了一封信，信中还附上了作为中国漆器原材料的漆树的种子，并传达了以下信息：

这里生长着大量的草药，而且似乎有相当一部分是新奇的植物。由于植物学家不了解中国的这一地区(无论在任何方面与南方、北方和沿海省份相比)，我们也许能获得新奇的标本。我对植物学知之甚少，也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不过，如果你认为那些标本有用的话，我很乐意为您收集并将它们邮寄给您。

1

邱园的回答非常热烈。当时，邱园植物标本馆的大部分干制标本都来自华东沿海地区，而对华中地区的植物群却几乎一无所知。²有了这样的响应，亨利的临时消遣很快就成了一种充满激情的追求。亨利以一贯严谨的态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新爱好，并和当时主要的中国植物猎人取得了联系。例如，1885年4月20

日和 6 月，亨利收到了英国驻中国东南部广东省黄埔地区的副领事亨利·弗莱彻·汉斯的来信。汉斯是一位公认的中国植物专家，拥有一个包括 22437 个标本的植物标本集。汉斯在信中向亨利推荐了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的两卷《谭卫道植物志》，其中第一卷已于前一年在巴黎出版。他还就如何干燥标本和保护标本免遭虫害提出了建议。亨利认识到这个建议在指导植物的叶子、花朵和种子如何收集，用纸张晾干和压制方面是多么重要。然后这些标本可以被分类学家用来描述和命名每一个新的物种或亚种，并被保存在植物标本室中以备将来参考。

1885 年 11 月，亨利将他的第一批 1073 个干制植物标本和 183 种水果和种子送往了邱园。邱园在收到这批标本后（1886 年春天），对每一个都进行了严格的编号和日期标注，并记录了它们的中文名称、采集地点、形态特征、生长环境和经济用途。丹尼尔·奥利弗教授在邱园的档案中写道：“这批藏品是我们从中国内地收到的最重要的藏品之一。”它包括了 120 个植物新种、亚种、变种和形态。这批藏品中的有些植物后来成为了爱尔兰每一个精致的花园必不可少的部分，比如美丽的大理石攀缘植物花叶地锦和带有深脉状叶子的皱叶莢蒾。亨利很快就意识到，华中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使其本土植物足以适应不列颠群岛的环境。到目前为止，他对观赏植物、药用植物和经济植物也产生了兴趣。

由于这些早期的植物采集活动，奥古斯汀·亨利的采集成果成为了伦敦林奈学会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植物名录》（1886-1905）第一卷的主要资料来源。³这套书的作者是邱园标本馆的助理管理员弗朗西斯·布莱克威尔·福布斯和伦敦林奈学会的会员威廉·博廷·赫姆斯利，他们花了近 20 年时间才将其完成。对于亨利

来说，第一卷的出版时机再好不过了，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采集的标本都被保存在了可能是英语世界中资源最为丰富的植物园。

然而，从 1885 年到 1887 年在宜昌的早期阶段，奥古斯汀·亨利的采集活动最初“仅限于方圆 15 到 25 公里和海拔不超过 1000 米的范围。夏天的高温常常达到 38 度，而冬天却非常寒冷，还会下雪，但很少有霜冻的痕迹。”⁴在这段时间里，他于 1888 年在《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植物的中文名称》的文章。这些植物的学名主要来源于邱园，而汉语俗称则在《植物名实图考》和《本草纲目》这两部中国古代药典中使用。其中对超过六百种植物进行了命名，以下是两个有趣的例子：

10. 茶，山茶花 [茶]最好的本地茶是罗天池（音译）乡出产的。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茶叶产自该地区南部。

115. 何首乌，蓼属。当根与人类形象相似时，它通常会卖出大价钱，被认为是一种珍稀中药。

事实上，所有的例子都非常有趣。这些中文植物学名的出版也消除了很多中英文名称之间的混淆。

1888 年 4 月，也就是他祖母去世的那一年，亨利从海关那里申请了六个月的假期。他离开宜昌，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长江南北山脉之旅。当亨利和他的采集团队开始第一次出发时，安特卫普·埃德加·普拉特先生一直陪同他们去到了长阳县。虽然普拉特主要对动物标本感兴趣，但亨利说服他雇用了一位自己训练过的当地人收集植物标本，后来这些标本也被送到了邱园。普拉特在他的著作《穿越

中国的西藏雪域》（1892）的序言中，感谢了亨利（还有许多人）对他的善意和帮助。

亨利在一些当地人的陪同下，前往长阳县、巴东县和四川省巫山县的南部，这是一次既令人兴奋又收获颇丰的旅行。长阳县是一个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以及有野猪、老虎和豹子出没的危险地区。亨利实在太忙了而没有时间写日记，但随后收集的标本数量却是惊人的。普拉特描写了金银花的香味和盛开着巨大的白色芳香花朵的杜鹃花。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三种树：江南花楸（白花楸）、建始槭（亨利槭）以及目前生长在爱尔兰国家植物园里的山拐枣。鹅掌楸（中国的郁金香树）也是在这次旅行中被发现的，在此之前它被认为是同属于北美鹅掌楸。他们还采集了川泡桐和毛泡桐这两种毛地黄树。后者和另一棵探险中发现的独特的常绿乔木水丝梨一样，都种植在爱尔兰国家植物园里。

这趟旅行中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树木清单很长，也很吸引人。但也许最重要的发现是一种装饰着大白苞片（一种变种过的叶子）的光叶珙桐，因此它被昵称为手帕树。当亨利描述第一次看到这种中国人所说的鸽子树时，他回忆说，

当时他正骑着小马穿过一个河谷，他在一个巨大的悬崖底部附近看到了一棵壮观的缀满繁花的树。正如他后来谈到的那样，那是他在中国目睹的最奇怪的景象之一。那棵树的树枝上像是挂满了成千上万幽灵般的白色手帕。⁵

他后来的报告中提及，1888年5月17日，他在深秋时节派了两名值得信赖的本地植物采集者到著名的长江三峡以南的地方，来确保获得光叶珙桐的果实，这些果实也是欧洲人第一次见到的。亨利是第二个发现这棵树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个发现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方人。令人激动的是，1889年邱园收到了

来自亨利采集的标本。当时，亨利并不知道这棵树将开启一个从中国中西部引进植物的伟大时代。

亨利回到宜昌几天后就又出发了。他途径东湖、保康、房县和巫山，最后来到了长江以北。亨利在 1888 年 10 月 9 日致威廉·西塞尔顿-戴尔爵士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已经离开宜昌将近两个半月了，刚刚结束第二次旅行回来。我从宜昌往北，一直游历到长江和汉江流域的分水岭。然后我又沿着分水岭向西，一直到四川，然后再抵达长江和湖北四川的边界。两三天前我沿着急流回来了。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亨利描述了这趟突如其来的归程：

我几乎不喜欢这次旅行，因为河水泛滥，实际航行时间只花了十个小时。我和另外二十个人在一条小船上，带着十几箱珍贵的干制植物，我知道哪怕是一次错误的转舵这样最轻微的事故，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些箱子的丢失。⁶

亨利在信中还写道，这个地区有很多有趣的松柏门植物，以及四种醋栗属（浆果灌木，其中一种有优质的灯笼果），一种桦木属（一个包括桦树、桤木、榛树和角树的阔叶树种），许多槭属（枫树），一种奇怪的悬钩子属（未经确认的），一种草莓属（草莓）以及许多蔷薇属和荚蒾属植物。他还指出，在这些海拔较高的地区可以找到许多来源迄今都不为所知的重要中药。在中国拿来药用的大黄和另一种重要的药物党参（“穷人的人参”的干根）在这些地方也很常见。此外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草药，他会把这些草药的详细资料和标本一起寄出。亨利写道：“我的旅途非常愉快，和当地人相处也十分融洽。”他还说：“以前从来没有外国人甚至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到过这些地方。”⁷

亨利因为这些探险活动收集到了大量的标本，尤其是那些新标本（仅槭属就有十个新树种）。其他许多人也把收集到的植物标本寄到了邱园，由著名的植物学家威廉·赫姆斯利进行鉴定，并收录到这个新的中国植物名录中，这其中就包括牧师厄内斯特·法贝尔在峨眉山收集到的。此外，安特卫普·普拉特先生和他的中国采集团队在 1889 年到 1890 年之间收集到的植物标本也寄到了邱园。这些标本来自中国西部与西藏东部交界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附近，其中至少包含了 500 个新种。后来，亨利·德·奥尔良王子在同一地区又发现了 150 个新种。但是在所有这些新种中，没有一个新属，而亨利和法贝尔牧师(亨利 1887 年第一次和他在宜昌见面)已经记录了大约 25 个新属。

正如威廉·赫姆斯利所观察到的,当他在 1882 年开始罗列中国所有已知植物的实际清单时，中国中西部省份的植物几乎没有任何记载。虽然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弗朗谢先生已经出版了《谭卫道植物志》，但它只包含了“相对较少的新奇物种，而且其中没有新属”。⁸亨利训练当地人为他采集和压制标本，因而他能够收集到如此多样的标本。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记录了他们的酬劳情况：从 1885 年开始时的一个人，再到 1886 年的两个人，最后到 1888 年的四个人。那年秋天，他派遣他们采集了一批新的水果和种子，然后寄到了邱园。在邱园，丹尼尔·奥利弗教授用光叶珙桐的种子制作了图画，但他没有将它们播种，即便如此两年后他仍然写道“光叶珙桐是一种值得专门前往中国西部进行采集并引进到欧洲花园的树种”。1888 年，当手帕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西方植物猎人欧内斯特·“华人”·威尔逊第一次探险的唯一任务时，这项任务得以实现。

到了第二年春天，即 1889 年 4 月，亨利离开中国大陆，被派往中国南海的一个热带岛屿海南任职。他的离任，既是悲伤的又是喜悦的。《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公报》在 1889 年 3 月 15 日报道说：

在宜昌待了将近七年后，亨利博士今天离开了宜昌。为了纪念他，人们几乎把所有松月屯（音译）的报春花都摘了下来献给他。当他沿着江边走过的时候，江道两旁的烟花和罗马蜡烛为他绽放和点燃。这些烟花是中国海关工作人员对他的致敬。这个小小的欧洲社区最后一次为他举办宴会，他对每个人都表现出善意，人们都会非常想念他。

亨利途径香港前往海南省省会海口。那时海南的山区覆盖着茂密的热带森林，整个夏天热带风暴频繁。亨利的主要采集活动是在海口周围进行的，那里有许多水果和蔬菜（例如番石榴、木瓜、绿豆和红薯）。那里的莲花也很茂盛。亨利再次招募了当地的植物采集者，收集到了 740 多个标本。但亨利患上了疟疾，健康状况也不佳，他仅仅待了四个月就离开海口去了香港。

亨利获得了两年的假期来恢复健康，他离开香港绕道前往爱尔兰。途径日本时，他遇到了日本植物学家松村任三，然后又陆续经过旧金山、芝加哥、多伦多，并于 1889 年 10 月 17 日到达科克郡的科夫。他回到爱尔兰北方的泰纳后，与其他植物采集者保持着通信，这其中包括了英国驻华领事处的威廉·理查德·卡莱斯和驻扎在云南西北部的赖神甫。1867 年，赖神甫跟随巴黎外方传教会前往中国，并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进行传教。1881 年回到法国后，赖神甫遇到了阿德里安·勒内·弗朗谢，弗朗谢说服他为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植物标本。1882 年至 1895 年间，赖神甫在云南西北部传教期间，向巴黎博物馆寄回了 20 万个植

物标本。弗朗谢估计这些包括了 4000 多个物种，其中 1500 种是科学上的全新物种。

1889 年，亨利仍然马不停蹄，回到家乡不足一个月就动身去了邱园。在那里，他意外地受到了邱园园长威廉·西塞尔顿-戴尔爵士、描述过他收集的蕨类植物的约翰·吉尔伯特·贝克、植物标本馆的管理人丹尼尔·奥利弗教授、奥托·斯塔普夫博士以及对亨利收集的大部分植物标本进行过研究的《中国植物名录》的作者威廉·博廷·赫姆斯利的欢迎。在那天晚上为亨利举办的特别晚宴上，他见到了许多植物学界和园艺学界的重要人物，其中就包括了追随亨利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哈里·维奇爵士。几代人以来，维奇家族一直向美洲、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中国等世界各地派遣植物采集家。后来受到亨利的影响，是维奇家族将他们中最成功的植物采集家欧内斯特·“华人”·威尔逊送到了中国。

亨利在伦敦花了十八个月的时间整理他自己和其他收藏在邱园的植物：这是一项必要的任务，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库存；而且他拥有读懂中文笔记这一非常有用的技能。这段经历对他几年后在赫姆斯利的指导下编写（和亨利·约翰·艾维斯一起）《大不列颠与爱尔兰树木志》很有帮助。

在中国期间，亨利一直与阿斯隆的伊芙琳·格里森保持着联系。1891 年，亨利在拜访她时，遇到了她来自伦敦的朋友卡罗琳·奥里奇。1891 年 6 月 20 日，他们结婚了。婚后他们去了中国，定居在上海。不过那时候，卡罗琳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亨利要求调到台湾，他认为那里的天气适合她疗养。但由于在台湾卡罗琳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改善，她最终在 1894 年和亨利的妹妹一起前往了科罗拉多州，亨利希望她能在那里得到康复。

在此期间，亨利还在 1893 年发表了《中国经济植物笔记》。该书由美华书馆出版，亨利在序言中对其他业余植物学家呼吁到，因为“传教士和生活在内地的其他人经常能够对中国自然生产状况进行调查，其结果将对科学大有裨益。”在这本七十页的书中，亨利解释了为什么拥有植物样本并且能够正确识别它们是如此重要——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

两个物种的果实外观非常相似，其性质可能截然不同。因此，日本产的“假茴香”日本莽草不但没有香味，而且含有剧毒。而广东和安南（今属越南）产的“真茴香”八角则是芳香的、健康的和有用的。

虽然尚不清楚这一呼吁所针对的传教士是否作出了回应或者他们是如何回应的，但它确实揭示了他们在向西方传递有关中国的重要信息方面常常被忽视的角色。

亨利在派驻台湾期间（1892 年至 1894 年），辞去了医疗工作岗位，转而获得了一个新的海关助理的职位。卡罗琳病得很重，他感到悲伤和沮丧——在之后的几年里，他担心自己能否为她做得更多。但是，植物的采集工作仍在一如既往地进行着。1893 年 5 月，亨利联系到了哈佛大学毕业生的、海关关长马士。他驻扎在台湾淡水，直到 1895 年日本入侵。马士是加拿大出生的美国人，后来成为英国公民。他最为人所知的著作是讲述清朝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三卷本编年史《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在亨利的呼吁下，马士同意为他收集植物标本。虽然亨利已经有一些当地人在灯塔看守人

舒斯特先生的监督下为他工作，但他在自己出版的《台湾植物名录》中感谢了马士的帮助。

1886年3月，邱园发表的《福尔摩沙（台湾旧称）植物学报告》中提到了这次实践，“奥古斯丁·亨利的笔记具有特殊的价值”。在这些笔记中，亨利表示他已经向邱园寄送了两千多个带有复制品的干制样本，其中涵盖了一千个物种。他描述了其中的几种植物，包括芒果、龙眼和一种常见的榕树。他还提到了所有早期的植物采集家：查尔斯·威福、理查德·奥尔德姆、罗伯特·斯文豪、查尔斯·福特、威廉·坎贝尔、G·M·H·普莱费尔和（特别是）两个爱尔兰人威廉·汉考克和托马斯·沃特斯。他同时也指出普莱费尔的收藏品在《中国植物名录》被遗漏了。

1894年5月，亨利还写信给波士顿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的创始园长查尔斯·斯普拉格·萨金特教授，提议向他出售自己的植物标本集。虽然亨利那时希望辞去海关工作，与妻子在科罗拉多州团聚，但是海关只给了他一年的假期，而且要到这一年11月才能休假。与此同时，台湾受到日本入侵的威胁。9月，正当亨利动身前往科罗拉多州与卡罗琳会合时，那个月的25日传来了她去世的噩耗。因此，当他最终抵达科罗拉多州时，迎来的是他妹妹的安慰，而不是最终与他妻子的团聚。后来，亨利把他在云南发现的小报春花命名为“卡罗琳·亨利”来纪念他的妻子。

在美国逗留期间，亨利拜访了阿诺德树木园的萨金特教授。阿诺德树木园成立于1872年，其使命是种植本土和外来植物，并通过研究和教育增加人们对木本植物的了解。在那里，亨利把他的一些标本卖给了萨金特，后者又将它们重新分配到了美国的主要植物园。

当亨利最终回到伦敦后，他再次与赫姆斯利一起进行中国植物的鉴定工作。在那里，亨利还开始学习法律，成为了中殿律师学院的一员。正如他的第二任妻子爱丽丝后来说的那样，“他穿着黑色礼袍吃晚餐”（这是对英国所有有资质的大律师的要求）。

1895 年秋天，亨利回到上海工作，但在 1896 年被派往中国西南部的云南：云南是中国第六大省份，也是中国植被最丰富的地区，那里生长着中国一半以上的开花植物。云南还是中国三分之一少数民族的家园。亨利从河内出发，经过中越边境的老街省，然后从那里前往古城墙环绕的蒙自县。如今，亨利工作过的海关大楼是一个博物馆，陈列着有关这座建筑的历史性文物、文件和照片。这座大约有一万人口的小镇，被大围山山脉所环绕，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亨利很快就在当地植物采集者“老何”的帮助下开始了采集工作，他在 1896 年 9 月 5 日寄给邱园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刚刚找到一个当地人在靠近中越边境、红河以南的山区进行植物采集，他从一座高山的原始森林中带回了大约 100 个有趣的物种……他还给我带来了真正的野生茶叶。到目前为止，这种茶树只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被发现是野生的，从中国记录的关于其自发性的情况非常可疑。目前的标本毋庸置疑来自原始森林，距离任何茶叶种植区都很远，离西边最近的普洱产区也有 300 多公里。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中国植物志》第 II 卷，第 130 页）对中国古代的茶有一些评论，直到六、七世纪它才开始被广泛使用（《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通报》，1897）。

虽然蒙自周边乡村的植物标本并不是那么丰富，但在距离蒙自两天路程之外的地方，植物的多样性却是惊人的。老何已经带回了叶子可以用作带香味的发油的珍珠菜属，一些樟科(月桂科)的新品种和几种蕨类植物。森林里有熊——这是原始森林的标志，但亨利并没有被吓倒。他能用的骡子很多，使旅行相对容易些；令亨利高兴的是，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从未见过的植物。

在这些山区，亨利还遇到了掸族、傈僳族（彝族）和苗族三个少数民族。他对傈僳族特别感兴趣：“我喜欢他们的装扮和说话方式”。源自于高度文明的彝族文字系统至今仍在使用中，保留下来的手稿有一个和常规汉字截然不同的书写体系。亨利经常去他们位于思茅的丛林村落拜访他们，这不仅是为了采集植物标本，也是为了编纂一部彝语词典。经过这样一次探险之后，他在 1897 年 2 月 23 日寄给邱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刚刚结束了一次非常有趣的红河以南的乡村之旅。那是一个由世袭酋长统治的地区，酋长对我非常友好”（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通报，1897）。几年后，也就是 1903 年，亨利写了一篇题为《傈僳族和中国西部的其他部落》的文章，刊登在《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学报》上，表达了他对稀有人种和稀有植物同样的兴趣。

在寄给邱园的另一封信中，亨利描述了他在哀牢山山脉上采集的植物并写道：

我找到了一株壮观的杜鹃花属，一株木兰属（两株都是大树），三株山茶属和折柄茶属[一小群与山茶属密切相关的开花乔木和灌木]等等。山峰上除了有一株瑞香属（大麻属？），一株开着芳香白花的灌木和一株报春花属[报春花]，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种属。生长在红河沿岸的热带植被有香蕉、西红柿、

木瓜以及最奇怪的树——猫尾树，它的豆荚几乎有一米长，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棕色毛发，就像动物的尾巴。

尽管亨利已经对 660 个不同的植物种属进行了编号和标记，但他预计这一年收集的植物标本将达到 3000 种。总而言之，亨利估计他的收集总数将达到 5000 种，再加上赖神甫收集的 5000 种，到二十世纪云南植物群中将会有 10000 个种属得到鉴别。在他发现的球茎植物中，有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大百合的百合花，是目前在西方种植的最珍贵的百合之一。亨利有些惊叹地观察到，虽然“兰花种类繁多，但他可以无限期地谈论其他物种”。他还描述自己看到了鹿、鼬（黑色小鼬鼠和会飞的大鼬鼠）、鹧鸪、雉鸡、蛇、老虎和豹子。但令他感到绝望的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所有这些采集活动最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因此，他在 1897 年 7 月 19 日寄给邱园的一封信中建议到，“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植物群如此丰富多彩，这些植物非常适合欧洲的气候，我们应该尽量派出一支小型植物探险队”。（《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通报》，1897）

在这段时间内，亨利从驻广州龙州的海关官员马士那里收到了 400 个植物标本。与此同时，驻思茅南部的邦·当提先生也在为他收集植物标本。到 1898 年亨利被派驻到思茅的时候，他已经寄送了 32 个箱植物标本，这些标本分别被送往伦敦的邱园和美国的阿诺德树木园。

在前往思茅的十八天旅途中，亨利穿越了把边江附近的森林，那里是野生孔雀和家禽的祖先原鸡的家。当时，亨利作为代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和大清帝国在思茅的官员代表身份，伴随着鞭炮声和挥舞的彩旗，一路上由三队士兵护送着，被人们用轿子抬进了小镇。在与萨金特教授的通信中，亨利描述了一个独特的区

域植物群，对它与蒙自植物群的不同感到惊讶。不过他发现更有趣的是人类居民的异常多样性，他观察到“有四到五个截然不同的种族”。但是由于亨利在他的新岗位上承担了额外的责任，因此大部分的植物采集工作便由老何来做了。

两年后的 1899 年 4 月，老何因疟疾而病逝。不久之后，亨利写信给他的朋友伊芙琳·格里森说：

他是最诚实和最勤奋的，他的结局却是如此悲惨。他在试图回来的时候死在了路边。他的同伴把他的尸体留在那里，希望能把他埋在村子里，但是村民们拒绝了，所以他们来到了我这里。我派了一群人把他的尸体运回来，隆重地安放在棺材里（这是在中国唯一需要重视的问题），如果顺利的话他明天就会被安葬。这样诚实的一个人是无人可取代的。⁹

事实上，几乎所有来自云南省最好的发现都归功于老何。在后来的几年里，亨利按照传统的向发现新植物的人致敬的方式，用大叶千里光（雏菊的一种）和红河鹅掌柴（鹅掌藤）的命名来纪念老何。

那年 2 月，在一次对思茅周边为期两周的官方考察中，亨利对森林砍伐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他再次敦促邱园和阿诺德树木园派出一名训练有素的植物采集者。萨金特教授希望亨利亲自担任这个职务，但亨利拒绝了，他说他需要一个年轻人。在亨利的坚持和施压下，邱园说服了詹姆斯·赫伯特·维奇父子有限公司旗下的伦敦维奇苗圃派出了一名受过邱园训练的植物采集者。那个人就是二十四岁的欧内斯特·亨利·“华人”·威尔逊（1876-1930），一个曾在伯明翰植物园受训过的邱园学徒。维奇给予威尔逊的指示如下：

这趟旅程的目的是收集我们所知道的一种植物的大量种子。这就是目标——不要把时间、经历或金钱浪费在其他任何事情上。为了促成这个目标，你要先去拜访奥古斯汀·亨利博士，并尽量获得关于这种特殊植物的生长环境的精确数据以及关于中国中部一般植物群的信息。

这种植物就是最初由亨利在 1888 年发现的珙桐或称手帕树。

由于洪水迫使旅行计划的改变，以及中国国内针对外国人的骚乱在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达到高潮，威尔逊的行程因而被打断了。在蒙自，海关总税务司大楼被大火烧毁，大楼里的人被迫穿着睡衣逃跑。第二天早上威尔逊在到达后，描述了这场闹剧带来的后果。“我看见有五名暴乱者的人头被放在一个木笼子里，悬挂在树枝上。后来我遇到一群官兵带来了另一个毛骨悚然的人头。”1899 年 9 月 24 日，当威尔逊终于见到亨利时（幸运的是不在蒙自，而是在更为平静的思茅），亨利在一本笔记本的半页纸上画了一张地图，上面标记了珙桐的位置。威尔逊的精力、热情、知识和幽默给亨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后来成为了终身的挚友。

在最后一次任职期间，亨利得到了提拔并调回了云南的蒙自，他一直在那里待到“19 世纪的最后一天”1900 年 12 月 31 日才退休。亨利回到欧洲以后在伦敦待了一年，他一直忙于研究他采集的中国植物。在那里，他结识了邱园的助理园长威廉·杰克逊·比恩。他还去利物浦拜访了亚瑟·K·布利。布利曾给在中国的亨利写过热情洋溢的信，请求他收集各类种子，后来他还赞助了前往中国探险的乔治·福雷斯特和弗兰克·金敦-沃德。亨利也通过自己的很多关系，成功地说服其他同事派遣更多的植物采集者到中国去。例如，美国农业部植物引进部门的主管戴

维·弗莱查尔德写道，“他给我提供的信息让我下定决心向中国派遣探险家。”弗兰克·尼古拉斯·迈尔和著名的约瑟夫·洛克都是其中那些因为亨利的劝说而被派往中国的。

1902年10月，亨利搬到了法国，在南锡一所林业学校学习。第二年的4月，亨利·约翰·艾维斯拜访了他，恳请他共同研究和编写《大不列颠及爱尔兰树木志》。艾维斯是一位英国地主和杰出的博物学家，他热衷于资助和组织出版一本有关树木的权威参考著作。在他的邀请下，英国和爱尔兰所有本土和非本土树木的优质标本都得以鉴定、勘察和测量。树木的个体历史、生长条件和生产环境以及它们的照片都被记录了下来。根据他们丰富的旅行经历——遍及欧洲的每个国家和美国几乎所有的州，也遍及加拿大、智利、中国、印度、日本和西伯利亚西部——两位作者断言，英国和爱尔兰拥有世界温带地区的优质树木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就爱尔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树木而言，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这部七卷本的著作（1906年至1913年间一卷一卷地出版）仍然是“迄今为止出版过的最伟大的树木学著作”。¹⁰

1907年，亨利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林学院的高级讲师，后来又升任教授。1908年，亨利与爱丽丝·伯蓝顿结婚，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家庭幸福时光。在此期间，亨利决定回到爱尔兰。1913年，他被任命为都柏林皇家科学院(现为都柏林大学学院的一部分)新设立的林学讲座的教授，直到1926年退休。亨利的家族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奥·因纳利家族，他为自己的爱尔兰血统感到自豪。因此在都柏林期间，他与许多凯尔特复兴运动的参与者成为朋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人中包括了艺术家兼诗人的乔治·拉塞尔（被称为‘AE’）和画家杰克·巴特勒·叶芝（威廉·巴

特勒·叶芝的弟弟)。当他的朋友伊芙琳·格里森建立旨在促进爱尔兰工艺和版画发展的邓·埃默中心时，他提供了支持；据说他对赫拉斯·普朗克特的工作和他发起的合作运动表示非常钦佩。

在此期间，亨利也被授予了许多荣誉：

剑桥大学荣誉硕士；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维多利亚荣誉奖章；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维奇纪念章；伦敦林奈学会会员；法国农业自然协会通讯会员；爱尔兰皇家学院会员。

但也许对他来说，最好的赞誉是 1929 年来自中国的一封信：

致奥古斯汀·亨利

通过您在中国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孜孜不倦的植物学探索，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植物群知识。在此我们诚挚地向您奉上《中国植物图谱》的第二卷。

胡先骕教授和陈焕镛教授

1929 年

中国北京

当中国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胡先骕教授给亨利写这封献词时，也表达了他对亨利所做工作的个人敬意，他指出：

作为中国西部地区植物研究的先驱和资深的植物学家，您不仅为世界补充了许多关于中国植物群的科学知识，而且也为中国的植物学学生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我们谨向您献上我们的一点心意，感谢您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1930年3月23日，奥古斯汀·亨利在爱尔兰都柏林拉尼拉的家中因病去世。

在他的一生中，他让西方注意到了中国植物群的美丽和多样性。亨利亲和友善的性格以及与不同国籍、不同身份和不同背景的人合作的能力，也把许多迥然不同、充满热情的博物学家的作品汇集在了一起。

今天，奥古斯汀·亨利作为爱尔兰林业界的杰出代表、著名的植物猎人以及植物猎人的拥护者而被人们所铭记。爱尔兰在全球植物学方面的成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开创性工作的认可。人们在格拉斯内文的国家植物园就能看到亨利采集回来的一些植物标本，那里是奥古斯汀·亨利林学典藏标本的所在地，在他死后的八年里由他的第二任妻子爱丽丝整理汇集而成。人们不需要去都柏林的国家植物园，更不需要去伦敦的邱园，就能看到亨利从中国带回来的珍贵植物。最终，他最永恒的遗产将是每一种带有“henryii”、“henryanus”或“augustinii”这些特定称号的植物。山茶花、蓝花杜鹃、芳香的巴东荚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美丽的橙金色百合、甚至如今在我们的城市地区大量种植的醉鱼草，还有现在装点着爱尔兰和西方世界所有其他温带地区大大小小花园的瑰丽树木和娇艳花朵，这些都是亨利留给后人最有形的遗产。

参考文献

¹ 20 March 1885, Kew mss. 579. 亨利写给邱园园长的所有其他信件都在这个档案中。

² Seamus O'Brien (2011), *In the Footsteps of Augustine Henry and his Chinese Plant Collectors*, Woodbridge, Suffolk, UK: Garden Art Press, p. 22.

³ 这是一个致力于自然历史、进化和分类学研究的学会，它是由植物学家詹姆

斯·爱德华·史密斯爵士于 1778 年创建。学会是以卡洛勒斯·林奈的名字命名的，林奈通过双名命名法将生物分类系统化。

⁴ Emil Bretschneider (1898),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London: Sampson Lowe, Marston & Co., vol. 2, p. 775.

⁵ Seamus O'Brien (2011), p. 79.

⁶ 亨利，奥古斯汀（1902），《中国的森林中》，《花园》第 61 卷，pp. 3-6. 全文参见 Seamus O'Brien (2011), pp84-85.

⁷ *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Kew Gardens publication, 1889.

⁸ 《谭卫道植物志》实际上是 1862 年作为遣使会会士外派到北京的阿尔芒·戴维德神父在他的中国之旅中提供的“新奇事物”。他从那里出发探索了这个国家北部的大部分地区。1869 年，在前往四川宝兴县的途中，他发现了欧洲人第一次见到的手帕树和大熊猫。

⁹ Seamus O'Brien (2011), p. 297.

¹⁰ Seamus O'Brien (2011), p. 313.